

五服圖解一卷

(元)龔端禮撰

元泰定元年(一三二四)杭州路儒學刻本

黃丕烈跋。框高二十四·九釐米，寬十九·二釐米。每半葉十四行，行二十五字，白口，左右雙邊。

龔端禮，生卒年不詳。字仁夫。嘉興(今屬浙江)人，宋儒紳之胄。龔氏家學淵源深厚，其先祖龔頤正曾為宋朝宣教郎充樞密院編修官，兼資善堂小學教授，家傳有《五服圖》。五服，此處指古代的喪服制度，以親疏為差等，即斬衰、齊衰、大功、小功、緦麻五種名稱。

端禮繼承家學，搜求古今諸禮圖書六十餘家，編類成集，即《五服文集》，後又作《五服圖集》。時由江浙行省交嘉興路儒學羅應龍教授校正。兩書圖、論分離，散見雜出，查考先王禮制，頗為不便。端禮遂將其歸為一編，以五服列五門，每門列男女已、未成人之科，分正、加、降、義四等之服，推古詳今，逐一辨證，搜羅考證十餘年，於至治二年(一三二二)編集成書，並將此書分章作圖，又加以闡釋其意，故名《五服圖解》。

龔氏乃有心於天下之事，為闡揚名教，以厚風俗，此書撰成之後，自己出資將此書

銓梓。至治三年（一三二三）端陽日，嘉興路儒學者宿葉知本嘉其有功於國家政教，為此書作序，推獎此書有功於民彝世教。為將此書傳諸他人，使天下臣民、百姓知曉忠孝節義，泰定元年（一三二四）三月，嘉興路牒呈此書於江浙行省，移咨中書省。此書得到如此禮遇，龔端禮甚是欣慰，並對此書加以潤色、修改，約於泰定三年（一三二六）完成。此書《圖原》一節中述及「按古增劃《易曉之圖》，重別印造成集，具解江淞等處儒學提舉司次第進呈朝廷裁擇」。書中《易曉之圖》右上角有「泰定三年新注」墨記，此次重印之後可能已是泰定四年（一三二七），從文中也不難看出龔氏希望此書能夠引起朝廷足夠的重視。

此本今題「元泰定元年杭州路儒學刻本」，傳增湘《藏園群書經眼錄》著錄此本為元至治刊本。二者均有誤。按，此本卷首泰定元年三月嘉興路《進服書文》云：「據龔端禮已成是書，如蒙敦請本人，先以一本赴官，移文儒學校正，然後印行，庶使人民慎於孝禮，盡其誠厚之道，實非小補」；同年七月，省府答覆嘉興路總管府牒文云：「參詳上項服書，可以裨政教，厚風俗，如蒙刊行，誠非小補。」另龔氏在《圖原》一節中云：

「泰定元年七月，已蒙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委東陽縣達魯花赤馳驛咨發，前赴中書省照詳去訖。愚思此集乃當今官民必用之文，復慮世人不克周曉，故盡心窮禮，按古增劃《易曉之圖》，重別印造成集，具解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司進呈朝廷裁擇。」以上足以說明泰定元年杭州路儒學並未刊刻此書，而只是將龔氏至治年間自己刊刻的《五服圖解》上報朝廷，請求刊行，以裨政教、厚風俗。

然接下來的一兩年間，皇帝更換頻繁，朝中政權不穩。元文宗天曆二年（一三二九）曾下詔書，表明朝廷為使國家通達，要廣開言路。至順元年（一三三〇），龔端禮以布衣身份呈《上萬言書》，以天曆二年詔書為契機，懇請朝廷廣開言路，「欽望陛下詳覽」，准予刊行此書。傅增湘《藏園群書經眼錄》小注「上書時為至治元年四月」，疑誤。

《五服標目》之後列有此書評論、校正、校勘、保勘等人員官銜，其中有「文林郎江浙等處儒學提舉楊剛中重保」。元張絃《至大金陵新志》卷十三載楊剛中改授「文林郎江浙等處儒學提舉，修舉學政，省憲欽異，丞相托歡公薦於朝，召為翰林待制承務

郎，兼編脩官，赴官月餘謝病去」。查《元史·儒林傳》，楊剛中「仕至翰林待制而卒」；又明王鏊《姑蘇志》卷二十四：「文學書院在常熟縣行春坊內，元至順三年縣人曹善誠建，有司上其事，省部准設山長，翰林待制楊剛中記，宣慰使王都中題匾，今廢。」據此可推知，楊剛中至順三年（一三三二）已遷翰林待制，其為「文林郎江浙等處儒學提舉」在至順三年之前，故此書之刻約在至順二年（一三三一）前後，不會晚於至順三年。由此可見，此書於至順年間刊行，故此本應定為元至順年間刻本。元代官方刻書必須由本路進呈，經過逐級審批，上報中書省看詳獲准後，方可刊行。

此本少見各家史書著錄，僅明楊士奇《文淵閣書目》著錄「龔端禮《五服圖解》一部一冊」，黃虞稷《千頃堂書目》有「龔端禮《五服圖解》」。朱彝尊《經義考》則云未見，陸、丁、瞿、楊、張等諸家藏書目錄均無著錄，可見此本之罕傳。

書中鈐有「士禮居藏」、「汪士鐘印」、「閔源真賞」、「正閭經眼」等印記。表明此書舊為錢曾述古堂藏書，後歸黃丕烈士禮居，並經其重裝，再入汪士鐘藝芸書舍，清朝末年鄧邦述曾經見過此書。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。（李紅英）